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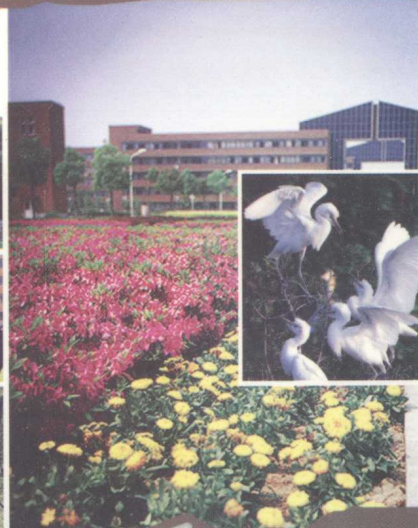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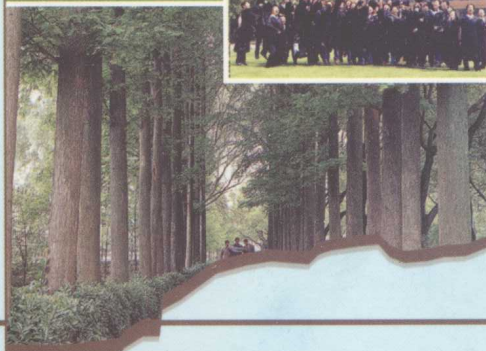
名家系列讲座精萃

第四卷

(试印本)

做人做事做学问

洛雨祥题



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组委会 编
二〇〇七年十月

做人做事做学问

名家系列讲座精萃

第四卷

(试印本)

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组委会 编

二〇〇七年十月

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组委会

※ ※ ※

名誉主任：严陆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名誉校长）

主 任：邢学亮（校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刘剑虹（校党委副书记）

成 员：

王国荣（党委宣传部部长）

严建雯（党委学工部部长）

胡 敏（校团委书记）

陈正良（法学院副院长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

王钱永（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汪盛科（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吴锡存（党委学工部副部长）

孙欢欢（校团委副书记）

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精萃

（第四卷·试印本）

编 辑：汪盛科 王立衡 崔 雨 胡 斌 孙建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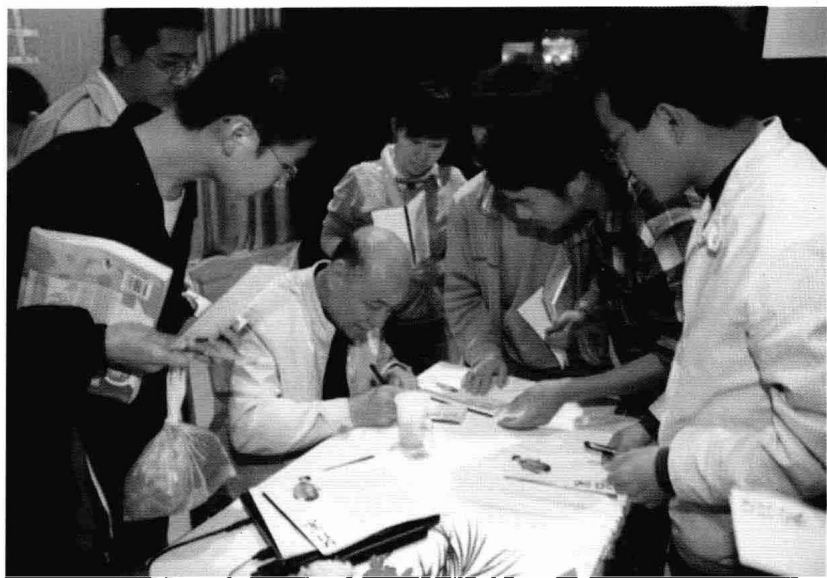
讲座现场



听讲学生



畅谈音乐与人生



与院士零距离

目 录

严陆光	我与宁波大学	1
徐至展	执著献身攀高峰	18
林崇德	豁达与勤奋——人生发展的两个风火轮	40
张永祥	任何时候都要对党充满信心	65
张 平	文学现状与作家走向	82
陈 钢	音乐与人生	113
朱自强	尽心尽力尽责任	135
方同光	做学问：博学强记 独立创新	160
王祖皆	心无半点尘 笔有千钧力	183
翟俊杰	惊涛骇浪的艺术人生	207
陈立理	陈中伟祭——女儿陈立理的追思	233
张奠宙	陈省身大师与数学文明	251
倪维斗	做人做事做学问	274
吴 光	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兼谈“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	294
跋		

我与宁波大学

严陆光

(2005年4月20日)



严陆光 1935年7月生于北京,原籍浙江东阳,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至2004年任宁波大学校长,现任宁波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1953—1954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59年苏联莫

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毕业,获电气工程师(优秀)称号。他长期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从事近代科学实验所需的特种装备的研制和电工新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开创了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的系统研制,建成了储能 6×10^7 焦耳的合肥七号常温电感储能装置。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托卡马克CT-6的电磁系统,参加了合肥八号托卡马克CT-8的设计和意大利强磁场FT托卡马克的调试。在超导电工方面,领导进行了多方面应用基础研究,研制成多台实用超导磁体,并在德国与日本进行了客座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很高兴能回到学校和同学们聊一聊。我想：“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应该很好地坚持做下去，这已经是第五年了！我这一次是第 53 讲，四年 50 多讲，也就是说一年有十多讲，幸运的是，在这五年中，每年的第一讲都是由我来的，今天是第五次。我想了想，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对每个同学的成长都很重要，我相信这几十讲讲下来，对同学们今后的成长会有一定的益处。所以，我还是很想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邢书记从第一讲就开始主持，这几年来坚持不懈；我们的宣传部、校办和学生处的同志也都积极地推进这个事情。所以我决定今天还是来讲。

我讲了四次，第一次讲了我的父亲：怎么继承和发扬我的父亲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好的地方。第二次我讲了自己：我自己怎么成长起来的。第三次我专门讲了我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因此我讲了我与电工新技术。第四次我讲了我与磁悬浮。这次，我和邢书记商量，换一个题目，叫做“我与宁波大学”，也就是讲我和宁波大学的情况。

去年，有两件对我很有意义的事。一个是去年五月份换届，我从校长职务上退了下来，聂秋华同志当了校长，我们校办的同志都很热心，把我从 1999 年 10 月份到学校以后，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在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讲话、写的文章，包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几个报告，编成了一个小册子。我今年快 70 岁了，我在学校里工作了五年，想把在这里的心得体会讲一遍。因为已经有了这本小册子，所以有了一定基础。

另外，俞建伟老师最近应宁波市文联的邀请，写了一本我的小传——《严陆光传》，是刚出版的。这本小传一共有 308 页。在这 308 页里，有 63 页写的是宁波大学，也就是 20% 的篇幅写了宁波

大学。我现在 70 岁，在宁波大学工作了 5 年，5/70 大概是 7%，我的 7% 的时间，在书中占了 20%，也就是说，宁波大学对我整个一生还是很重要的。基于这些情况，我想了想，今天就专门讲讲我和宁波大学！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了宁波大学后，成了一家人。我做这个报告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宁波大学办得更好。下面简单讲讲我在宁波大学这些年的想法、体会，跟同志们交流一下。我希望同志们觉得对的、合适的，能够取得一些共识。我们继续努力，把宁波大学这个大家庭越办越好。

我是怎么来宁波大学的

我 1959 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回国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1988 年起我在所里当所长，当了 3 届所长，1999 年换届，我从所长职务下来。我岁数也不小了，我是 1935 年出生的，1999 年我 64 岁了，我想回到研究室重新搞点科研工作还是可以的。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志的电话，他和我谈，建议让我去宁波大学做校长。我当时觉得：第一，我没有办过教育，原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没搞过教学。第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再来管事情，不大符合潮流。我就说我还是回研究所做点科研工作更好。路甬祥很客气地说，不管怎样，你去看看这个学校，愿意干就干，也不一定非得干，这样就安排我到学校里来了。

大概 1999 年 6 月份我就来到了宁波，感到市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张蔚文市长、盛昌黎副市长，他们都很热心，很真诚地希望我能

来。我觉得我既然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真诚地请我来，我能做事还是做！另外我们这代人非常习惯于自己的事情不由自己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听从安排，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习惯讲价钱，只习惯看这件事需不需要、值不值得干。

看到大家都那么热心，我就说，回去商量一下！回去以后，我见到了我的老领导——周光召同志。周光召同志当过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有名的物理学家，我问他说：“他们叫我到宁波大学当校长，你说我去还是不去？”他回答说：“我们这些人，既然都已经退了（他当时也退了，院长已经不当了，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能多做点事，比少做点事好。”后来碰到胡启恒同志，胡启恒是我们的副院长，是位女同志，也是工程院的院士。她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些人在一个单位管事管得很长了，管了十来年，退下来以后，最好不要老呆在单位里头，能换个环境也好。”这几个意见听下来，感觉大家都赞成，也感觉到真正需要我来干点事。另外，对我自己来说，能多做点事也好，我就答应了。经过省市的商量，让我1999年10月份来。

我一直在研究所工作，从来没教过书，不懂教育。我当过学生，在中国的学校念过书，在苏联的学校也念过书。另一方面，我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电工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参加过评博士点、评博士生导师的事，使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一点了解，但没有亲身经历。所以这个阶段，我就拼命想，假如我要来干，我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就觉得很需要学习，在来以前，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书，看办大学究竟应该注意什么，干些什么？

第一，我看了我的老父亲的一些遗著，他当时已经去世了，是1996年去世的。他是1900年出生的，原来在科学院做领导工作，58岁的时候到中国科技大学教书，教普通物理，教了好多年；后来

他还当过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他在老年时候，基本上把精力都搁在了教育青年一代上。所以我就想，一个搞科研的人，在老年阶段，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搁在教育上，我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几句话，他非常强调要有责任感。他说办学校、教书、教人要有责任感。他在一篇文章里是这么写的，我给同志们念一下：“现在的大学生，素质都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萎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青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觉得要么不来，要来就要有把学生培养好的责任感，没有责任感，是要误事的。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像父亲那样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十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科大的学生上。使我很感动的是，在他 1996 年去世的时候，科技大学 60 年代初期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千人，都是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其中有几十位从各地来到了家中的灵堂，给老父亲送了一副挽联，写道：“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一代哲人，学海高耸照前路；孜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三千子弟，悲风肃立悼恩师！”父亲老年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应下决心，要有充分的责任感来办教育，来培养青年人。

第二，既然我已经答应来当这个校长了，我又向几个当校长的老同志、院士请教，如潘际銮同志，他是机械方面的有名院士，是清华大学教授，后来到南昌办了南昌大学。还有刘盛刚同志，他是电子学方面的一位院士，当了十多年的成都电子科大的校长。我问

他们，叫我到宁波当校长，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干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你答应了当校长，要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只挂个名不管事是不行的，是不负责任的。”我既然答应来，做好做坏虽然与能力、经验有关，但自己必须认真负责的来做这个事。

第三，到学校究竟干什么？这个我完全没有经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所搞科研工作，也搞过一点组织领导工作，但学校我没干过。好多同志跟我讲，既然管这么大个学校，有上万人学生，几千人教师的学校，自己把“位置摆对”很重要。首先明确是来服务的，要努力服务好，把各方面的条件创造好，这是校长的责任！另外，要把大家团结好。所以一个总的定位想法，是要服务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教学和学习条件，让同学们和老师们能够很好的工作和学习，要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起来。

我当校长的几点体会

带着这么点初浅的想法，我就到学校来了。来了以后，得到了很多同志多方面的帮助。我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摸索，慢慢有一点体会，和同志们交流一下，如果对话的话，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和发扬下去，把我们学校办得更好。

第一、校长究竟做什么？

我来的第一天，在锦绣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干部会，宣布我的任命，叫我讲话。我讲，我到宁波大学是来做后勤部长的，要努力做好后勤部长。这话的缘由来自两方面。其一，1978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我有幸也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个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关于科技的报告，他讲了很多东西，大家都觉得挺好。有一点大家最受感动，就是他讲，他愿意做中国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他要当后勤部长，就是他不是来管大家干什么的，而是提供条件让

大家做事的。我觉得小平这句话讲得很好，应该牢记，我到学校不是来指挥什么，而是要想办法利用条件，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很好地学习、工作。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的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应该努力做好后勤部长。

其二，我们这个学校是1996年三校合并组建起来的——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来自方方面面不同背景的人走到一起来，要做好事，需要团结和凝聚，所以能不能当好后勤部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

我来了以后，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好一个后勤部长，把方方面面的同志凝聚起来做工作。到学校里就老老实实当校长，给大家服务。在学校里这么几年，我一直在推行、鼓励领导与管理干部当好后勤部长，好好为大家服务，注意把各方面环境搞好，注意把大家团结凝聚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喜的是，这些年我们是有一定进步的。

第二，学校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来校不久，有人采访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学校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中国的教育往上走，大概最重要的是教授应该在大学里面是最受尊重的人。学校办好要靠教授，靠教师。你不尊重教师，不尊重教授，就别想把学校办好。教授不下功夫，不努力去做，就没法把学生教好。必须把教授的地位提高，要尊重教授，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人。这个说法对我来说不新鲜，但来访者觉得很新鲜，就问：“你刚到学校不久，发现什么事情了吗？究竟有什么不够尊重教授的事情？”我回答说，我到学校后，也没人来告状说人家怎么欺负教授，但我总有一个感觉，学校里的教授们不够扬眉吐气。教授不够扬眉吐气不行，应该把教授充分动员起来搞教学，真正把知识都用来教学生，这样这个学校就有希望

了，教育就有希望了。

后来有几个同志说我这话有弊病。教授也是人，既有优点，也有毛病，不能说教授有毛病也得尊重。我想这个意见是对的，我就改了一个字，改成：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群体。不讲每一个人，从总的群体来看，教授应该是最受尊重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尊重教授群体，发挥他们的作用。年轻教师的理想应该是成为教授，而不是去当科长、处长、司长、部长。虽然司长、部长也是要人去做，但是那总是有限的，而教授是个大群体。当司长、部长终究是有限的几个人，而且也是短暂的，任期四年，当三期也不过是十二年，而当教授是一辈子的。大家应该都争这一部分，都努力提高自己，然后把自己知识力量都用在教育学生上，这个学校就有希望了。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说，与大家有了一定共识。大家有了共识以后，我就更觉得应该鼓励教授们要自爱，人家尊重你，你自己必须更加尊重自己，要真正成为我们广大师生们的榜样。鼓励教授们自己也很好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知识水平和处事本领。最近出了一本书——《走进中国 100 个院士的家》，牛群写了一个序言，写得非常好，说最受尊重的群体，应该是院士。我想对全国来讲是院士，对一个大学来讲这个群体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他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念：

“我爱他们，真爱，因为——

在浮躁的今天，这是最不浮躁的一群人。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是怎么都难以污染的一群人。

在牢骚太盛的今天，这是最没有工夫发牢骚的一群人。

在信念动摇的今天，这是最顽固不化坚守在理想王国的一群人。

崇尚自我的今天，这是最懂得尊重别人的一群人。

在珍惜生命的今天，这是最把民族的命运看得至高无上的一群人。

然而，在国家走向强盛的今天，这又是最不愿意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上、放在心上的一群人——”

我想，教授这个群体大概应该具有牛群同志描述的这些素质。这个群体，正在成长壮大。我来的时候，好像只有 50 多个教授，现在有 172 个教授。可见大家还是努力的。我们大家尊重教授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非常努力，非常自爱，我们的大学就能办得更好，中国的教育就能上去。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

老父亲告诉我们，要办学校，就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对学生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把学生培养起来，让他们有志气，让他们成才，不要在我们的教育下，一个个成为毫无志气、成不了才的人，这样就是误人子弟。

但是怎么样把学生的素质搞好？质量搞好？我们是个综合性大学，专业非常广泛，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专业知识，难以有统一标准。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题——做人做事做学问。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不管你将来干什么，你在大学这个人生成长里重要的黄金时代，都应该努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想法来源于汤于瀚先生在学校的一次讲话。

汤于瀚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医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的医学科学院院士，他出资建立了我们的医学院。2000 年 11 月他到学校来，我陪他到医学院去，他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讲了 20 多分钟的话。题目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讲他这 80 年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道理。我听着挺好，学生也挺高兴，讲得很浅显明白。

2000 年年底，我父亲 100 岁的诞辰，中央在北京给他开了一个

纪念会。叫我们几个兄弟写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继承和发扬父亲做学问做事与做人的高尚品德》。因为我们想父亲是科学家，首先讲的是他怎么做科学，然后用科学怎么去做事，最后说做人。这篇文章送到了《科学时报》（当时叫《科学报》），编辑把我们的标题倒过来了，改成《继承和发扬父亲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高尚品德》。后来我们一看，觉得挺好。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做人是首要的，首先要会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第二是做事，做学问是做事的一部分。

我们就想不管什么专业，在大学时代同学们都应该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从2001年开始，邢书记主持，我们就积极开展这个讲座，这个讲座现在已经是53讲了。这个讲座我们一半请了院士——27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还有很多国家知名人士，他们都有一定的成就，请他们来跟同学们讲讲他们的心得体会。我们这样规定，题目是共同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可以自己加副标题，你想讲什么都可以，可有一条，请他们一定从自身的体会讲起，他们觉得这一辈子过来，觉得什么东西最重要，和同学们讲讲。这样同学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对这个人有用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不一定有用。但各种各样的体会积聚起来，你可能会吸收到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管怎样，每年要搞个十多讲，这样希望同学在念书四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听过其中一部分，吸收一部分，对你们成长大概有好处。这个讲座开展以来，很多同学反映挺好，社会对我们也很重视。我们出了书，很多同学看着都还觉得不错，另外，我们也在和出版社联系，正式出版。

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我自己在这些年里，也是一边组织，一边推动，一边思索。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些想法。我给同学们多次

提了几句话：“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大概是2001年，即建党的八十周年时，我有个机会到济南去，那边有一个庆祝党的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那里，我碰到了谢芳。谢芳是6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她演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她还演过一个电影，叫做《舞台姐妹》。我看到她突然想起来，她演的是一个唱戏的，跟她师傅学唱。师傅教徒弟，留了两句话，叫做“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这是师傅给徒弟留下来的话，我觉得挺好的。这两句话对我们那代青年起了很大作用，也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做人要清清白白，做事要认认真真。回来我就改了几个字，改为：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人有各种各样的人，能力和成就都不是评价人的主要标志，主要标志还是清白。

什么是清白？清白就是没有污点。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污点的话，就不清不白了。人可以有错误，但是不允许有污点。错误人都会有，我们搞科学的人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你做的试验的结果可以有错误，你对问题的解释可以有错误，你写文章、你的想法可能会有错误，这都是允许的。事物不断在发展，过了几年一看，几年前写的东西不对，这完全可能。但你必须清白，必须没有污点。污点就是不能容忍的错误。比如说，剽窃和假造数据就是污点。对于我们搞科学的，是不允许的。做事情就是要认真，不认真做不成事，而最关键的是要做成事。

关于做学问，我又要引用老父亲的话，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他到过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时的校领导请他题词，他看到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他说，搞科学的人光“求是”是不够的，他就提了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对于青年人来说，